

元祐以後的程氏門人與同道： 從世家子弟、新興士人到白衣學子

紀晏如*

摘要

本文擬分析自元祐元年（1086）到大觀元年（1107）程頤過世為止，程氏門人及學術同道的組成及群體特質。元祐以前，二程門人主要為出身北方，歷代通婚的官宦子弟，在元祐以後，他們依然是構成程門的主要群體之一。元祐末到紹聖年間，以太學生為主的南方學子大量出現，他們多是這一代才具有太學生或進士身分，但家族較具規模，也有較多經濟上的支援得以從學。元符三年（1100）以後，出身北方的白衣平民學子開始出現，他們是與二程家族沒有淵源的一群，為學重心也更偏重於心性與個人修養之學。這三個群體在政局動盪中，都展現了寧願捨棄官位、受黨禍牽連也要堅守師門的記載，這固然表現出程門弟子的心志堅定，也顯示了洛學不僅是流傳在士大夫階層之間，也為平民出身、無意干祿的士人所擁抱、接受。

以往程氏門人研究，大半集中在學術明星如楊時、胡安國等人身上，以討論各家的學術異同流變為重心。又或是以新舊黨爭的角度出發，間或論及洛學門人遭遇。本文將分析不同洛學門人群體出現的時點和群體特質，是有別於過去研究之處。

關鍵詞：二程、程頤、關係網絡、宋代、儒學、理學、洛陽、士大夫、墓誌銘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前言

本文擬分析自元祐元年（1086）到大觀元年（1107）程頤（1033-1107）過世為止，程氏門人及學術同道的組成及群體特質。元祐（1086-1094）以前，以出身北方，相互通婚的士大夫群體為主。¹元祐末到紹聖（1094-1098）年間，以太學生為主的南方學子大量出現，如開創永嘉一脈的「元豐九先生」等人。元符三年（1100）以後，則是與二程無淵源、亦無家族背景的白衣學子（主要出身北方）。本文將分析不同洛學門人群體出現的時點和群體特質，分析他們的出現與時局關係，是有別於過去研究之處。

以往程氏門人研究，大半集中在學術明星如楊時（1053-1135）、尹焞（1071-1142）等人身上，²以討論各家的學術異同為重心。³又或是以新舊黨爭的角度出發，間或論及洛學門人遭遇。⁴近來程門的組成背景漸受重視，論者多以《伊洛淵源錄》、《儒林宗派》、《宋元學案》等理學典籍作為判別，對程門弟子生平進

¹ 孫逸超，〈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焞〉，《中華文史論叢》，2023：2（北京，2023.6），頁257-289。

² 集中於學術明星楊時、尹焞者如：李敬峰，〈二程洛學的羽翼、突破與轉向——以楊時為中心而展開〉，《學術交流》，2018：3（哈爾濱，2018.3），頁29-34；蔡方鹿、姜雪，〈尹焞的理學思想及其對程頤思想的傳播〉，《中原文化研究》，2021：1（鄭州，2021.7），頁54-60。

³ 徐遠和，《洛學源流》（濟南：齊魯書社，1987）；盧廣森、盧連章主編，《洛學及其中州後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等。另如《呂大臨評傳》、《道由中出——以呂大臨思想為中心》雖涉及呂大臨和關洛浙閩之間的聯繫，但重心放在分析呂大臨思想在關洛之間的影響及定位，與本文所欲探討之洛學群體特質無涉。參見：陳海紅，《呂大臨評傳》（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邸利平，《道由中出——呂大臨的道學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文碧方，《關洛之間——以呂大臨思想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1）。

⁴ 其中最著名者為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一書，其以政治史為主軸，詳細敘述了北宋神宗以後黨爭的過程。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蘇育成主要分析分析兩宋之交（1104-1142）舊黨恢復政治權利的過程及其與既有政治制度的互動。蘇育成，〈從再起到挫折——兩宋之交舊黨復權的政治史考察（1104-114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行考證。⁵但對理學家的「群體特質」與人際關係認識則尚有不足。或有從其他角度出發，對程門組成進行研究，如包弼德（Peter K. Bol）注意到，程頤在擔任侍講後帶來的政治資源是吸引四方學子主因，此前他只在地方上教學，受當地人士追隨，強調擔任侍講後取得全國聲望，得以吸引範圍更廣的學生；⁶李敬峰反之，認為程門弟子主要由進士和宦宦組成，政治關係複雜，如胡安國（1074-1138）所言：「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而其間志於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多是沉迷科舉仕途，借洛學之名圖個人私利者。⁷但其所引胡安國文字，是針對指崇寧（1102-1106）之後而發，並不足以概括二程授徒全期。且洛學迭經黨禍，程頤還曾勸阻學子前來，以免得罪。⁸此外，李敬峰又以「家族相似性」形容程門，並列出「師從二程，以程頤為主」、「多數思想雜染佛學」、「多在北宋，南宋寥寥無幾」、「傳承地域性特徵明顯」、「來源以進士和宦宦居多，與政治的關係複雜」、「所記二程語錄版本繁多，參差不齊」、「不喜著述且多數著作不存」等七項特徵。⁹但僅能稱之為共有特徵，何以用「家族」解釋其相似性亦無說明。

亦有學者強調地緣背景之別。尚紅兵主張程氏門人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洛陽人為主的京西士人如尹焞、李籲；一類則是北

⁵ 如高令印，《游酢評傳》（香港：中國翰林出版社，2002）；王巧生，《二程弟子心性論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這些書籍作者以《伊洛淵源錄》、《儒林宗派》、《宋元學案》作為判別二程弟子的標準。但近年來由於新史料，尤其是出土墓誌的發現，其中有諸多程門弟子史料，為過去書籍所未載，本文正可在這點上大幅補足原有文字史料的不足。

⁶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314。

⁷ 李敬峰，〈二程門人總體性特徵概述〉，《社科縱橫》，2012：10（蘭州，2012.10），頁104-105。

⁸ 「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清·池生春、諸星杓編，《伊川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卷7，頁308。

⁹ 李敬峰，《二程門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0），頁1-9。

上求學的南方士人如謝良佐（1050-1103）、楊時。¹⁰常見的說法是，古代地理交通不便，學派往往侷限於地方，思想上的共通處，則是理學跨越地域的主因。¹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陸敏珍對「元豐九先生」師友網絡與歷史背景的考察，開啟了對永嘉學派網絡的研究。¹²但在以對「道」的認同來識別彼我，以思想作為聚合的關鍵以外，¹³是否還有其他促使他們結識的親緣及地緣因素？況且在「九先生」外，程門尚有諸多永嘉及南方學子，他們又是否有什麼共通的特性，這是本文希望考察的問題。

本文將檢視理學家自身曾實際親身接觸的人物，排除《宋元學案》中續傳、私淑等關係，分析元祐以後的程門弟子群體特質。經由以上方法可以發現，元祐元年以後，程頤的的同道、門人共計有 51 人，其中有 20 位來自於二程原初的家族、婚姻網絡；22 位來自東南太學生群體；8 位是北方出身的平民學子，（詳見「圖 1」）。¹⁴這三個群體，應該相當足以代表程門在元祐以後的狀態，將在以下的章節進行分析。

¹⁰ 肖紅兵，〈居洛士宦與北宋神哲朝政〉（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1），頁28-33。然而宋代士人的關係聯繫豐富多樣，若檢視這些士人的出身背景和親緣關係，就會發現他們並不只有地緣上的關係。

¹¹ 申緒璐，〈人能弘道：二程語錄與洛學門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73-298；劉京菊，〈承洛啟闢——道南學派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40-48。

¹² 陸敏珍對「元豐九先生」關係網絡的考察可謂開其端者，王宇則由永嘉後人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程朱一脈長久以來站在理學主導地位對永嘉學派的批評。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王宇，〈永嘉學派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¹³ 陸敏珍，〈洛學傳人與洛學學派的建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廣州，2011.7），頁138-144。

¹⁴ 各個群體人物將於本文第二節「原初關係網絡後人」、「無淵源南方弟子」以及「無淵源平民學子」各節前製表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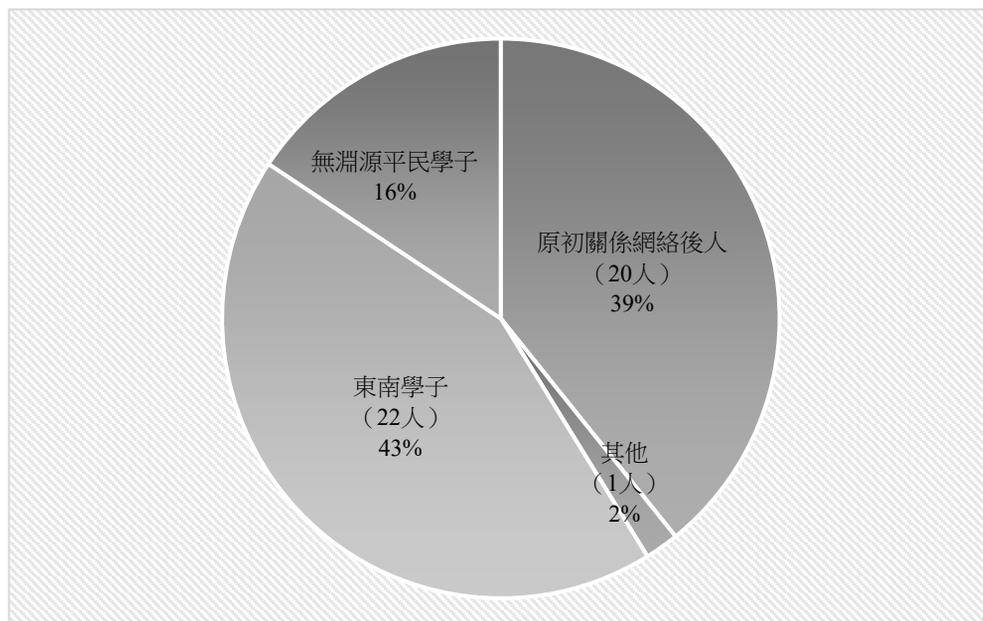


圖 1 元祐以後的程頤學術同道、門人

資料來源：根據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宋·朱熹，《伊洛淵源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宋·周行己，《浮沚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7，〈戴明仲墓誌銘〉，頁166；宋·黃震著，《黃氏日鈔》，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繪製。

二、元祐以後程學面臨的政治動盪

元祐以後政局波濤起伏，對程門命運影響甚鉅，本節將先進行介紹，以便更深入認識各階段弟子的出現背景。程頤在元祐元年入朝擔任侍講，「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¹⁵然而舊黨本身路線就有分歧，¹⁶程頤雖貴為帝師，但彈劾之聲一直不斷，因此在元祐二年（1087）黯然離去。此後回到洛陽，著力講學，在元祐二年

¹⁵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4，頁967。

¹⁶ 王曾瑜，〈洛蜀朔黨爭辯〉，收入王曾瑜，《絲毫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頁114-134。

八月至五年（1090）正月間受任勾管西京國子監，¹⁷「專主教導」。¹⁸

但隨著元祐八年（1093）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親政，紹述之議興，先是「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¹⁹被視為「元祐學術」的程學也未能倖免。紹聖元年（1094），殿試策問中有「誅元祐諸臣議」，尹焞因此感慨，「不對而出」，絕意科考。²⁰紹聖四年（1097）二月，程頤被「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送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編管。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即位大赦，程頤回到洛陽，十月，再判西京國子監。²¹可惜好景不常，崇寧元年（1102），對元祐政治再次進行打壓，先有該年七月的〈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之議；九月以司馬光（1019-1086）、文彥博（1006-1097）、呂公著（1018-1089）為首，立元祐黨籍碑，程頤之名亦在其中；十一月，下令禁絕「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²²崇寧二年（1103）三月到隔年九月間，又陸續令元祐黨人的子弟父兄不得「在京及府界」任官、入學及應舉，²³程頤之子程端彥也在

¹⁷ 西京國子監的配置大抵與東京類似，在元豐改制後的主要掌管內容為：國子學、太學、律學、武學、算學等五學之政令與訓導，以及刻印書籍等事項。由於資歷差異，洛陽國子監的最高長官署銜一般有判、同判、權同判，管勾、同管勾、權同管勾等不同稱謂。程頤此時職銜為「勾管」，顯為掌管洛陽國子監無疑。參見張祥雲，〈北宋西京國子監考探〉，《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12：6（周口，2012.11），頁75。

¹⁸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文集卷6，〈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頁557。

¹⁹ 元·脫脫等，《宋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71，〈章惇傳〉，頁13711。

²⁰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226。

²¹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41。

²² 宋·李心傳，《道命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2，頁14-16。

²³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卷121，頁13上、頁16上；同書，卷122，頁14上；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21、卷22、卷24，崇寧二年三月、九月、崇寧三年七月，頁737、頁772、頁819。

其中。²⁴崇寧三年（1104）六月，正式頒布「元祐黨籍」名單三百餘人，呂公著和程頤均被點名。²⁵同年十一月，致力打擊程學的范致虛（?-1129）知河南府，更將禁絕元祐學術的旨意積極落實，盡逐程門學子，程頤不得不避居龍門之南，遍告求學者：「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²⁶

在政治、學術的雙重打擊下，反對「元祐學術」者，甚至「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²⁷甚至有弟子「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²⁸但另一方面，求學者仍未曾斷絕，據載，「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²⁹留下這段記述者為朱弁（1085-1144），朱弁是南宋官員，曾就讀北宋太學，娶晁說之（1059-1129）姪女，³⁰和程頤、程門並無關係，身為局外人的他應該沒有為洛學粉飾的必要。說明了學禁雖是雷厲風行，不少程門弟子選擇了明哲保身，但仍有學子不絕如縷，繼續傳承學問。

學禁的發展，以崇寧三年黨籍公布為高峰，而後逐漸緩和：崇寧五年（1106）正月，出現彗星，徽宗認為此乃上天示警，大赦天下，陸續恢復黨人仕籍。程頤也奉命復職，但旋即以宣義郎致仕，³¹在大觀元年九月過世。程頤之葬，在洛只有尹焞、張繹

²⁴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52。

²⁵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22，頁9下-頁12下；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24，崇寧三年六月，頁810-815。

²⁶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56。

²⁷ 宋·何兌，〈馬仲逸士狀〉，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79冊，卷3923，頁170。

²⁸ 宋·朱熹，〈答程允夫〉，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卷41，頁1871。

²⁹ 宋·朱弁撰，張劍光整理，《曲洧舊聞》（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卷3，頁28。

³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373，〈朱弁傳〉，頁11551。

³¹ 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26，崇寧五年正月，頁868-874、880。

(1071-1108)、孟厚、范棫及邵溥(?-1148)前來拜祭，³²顯示了黨禍在士人心理上的影響依然深遠。

三、元祐到大觀年間： 隨原初關係網延續的程氏同道、門人群體

表 1 二程原初關係網絡後人

1、群體	原初關係網絡後人為主的洛陽仕宦家族子弟 (20+1 人)
2、時間	元祐元年 (1086) 至大觀元年輕頤過世
3、地點	洛陽
4、性質	原初家族、婚姻網絡；士大夫家族
5、人物	
原初關係網後人	范冲、尹焯、陳恬、劉唐老、劉唐詢、張閔中、邵伯溫、邵溥、邵博、周純明、呂好問、呂切問、范之才、范之翰、晏敦復、韓宗道、李處廉、李處遯、郭忠孝、李朴
其他仕宦家族子弟	吳給
6、關鍵詞	家族婚姻網絡、士大夫家族、北方出身、家學

資料來源：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宋·朱熹，《伊洛淵源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在此先說明何謂二程原初的學術同道：在二程的思想流傳之初，其學術同道主要來自於汴洛地區的高級官僚家族群體。³³此一群體包括了東萊呂氏、真定韓氏等北宋世家，他們與二程自上代起建立的婚姻、家族網絡關係密切（詳見「表 1」）。³⁴程學被稱為「洛學」，也是由於二程和此一群體長期在洛活動之故。³⁵元祐以前，他們是洛學群體的主要組成。元祐以後，程門差異性雖有

³²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4，頁973-974。

³³ 孫逸超，〈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焯〉，頁257-289。

³⁴ 王曾瑜，〈河南程氏家族研究〉，收入王曾瑜，《錙銖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頁277-281。程氏家族與高級官僚家族的婚姻、學術關係詳見：紀晏如，〈理學興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二程、邵雍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3）。

³⁵ 陸敏珍，〈北宋時期的洛陽與洛學〉，《浙江學刊》，2011：2（杭州，2011.3），頁117-124。

增加，此一群體仍是程門的中堅分子。本節中以程門「同道」和「弟子」稱之，「弟子」自然是拜入程門者，稱「同道」者是因他們屬於二程講友，並非純然洛學，但對學術推廣和流傳的意義來說卻非同小可。³⁶

程顥（1032-1085）雖於元豐八年（1085）過世，但此一關係網絡的成員及子姪後人，依然匯聚在程頤身旁。呂公著本是二程學友，熙寧二年（1069）就曾推薦程顥擔任監察御史裏行。³⁷元祐更化，呂公著回朝執政，更力邀程頤擔任侍講，培養哲宗，在程頤去職後，同為程氏學友的范祖禹（1041-1098，呂公著女婿）、呂希哲（1039-1116，呂公著之子）也先後任職侍講，³⁸繼續致力於「以道學輔人主」。范祖禹為二程至交，程頤稱他「其人如玉」。范祖禹過世時，喪事更由程頤一手包辦。³⁹呂希哲兩子呂好問（1064-1131）、呂切問也都拜入程門。在崇寧初年，學禁正熾時，呂切問仍不避嫌地拜會程頤，留下了「只有義命兩字」的記載。⁴⁰宣和（1119-1125）年間，呂好問還與程門高弟楊時並列，有「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呂好問字舜徒）」之稱。⁴¹

由呂家網絡延伸出的程氏門人，包括在蔡京（1047-1126）執政

³⁶ 本文第三、四節中所列，則均屬程門弟子，有明確拜入程門記載。「同道」則是二程退居洛陽，正式開始講學傳道前，就與他們有諸多交流的學友。例如「文獻故家」呂公著家保存了不少洛學史料，朱熹得益於與呂氏後人呂祖謙的切磋琢磨，開創出理學最博大精深的一脈。另一種情況是，同道本身並非洛學學者，但他們的家人朋友卻因此入了程門，如富弼外孫范之才、范之翰。在接引學子入程門這點上，亦是功不可沒。

³⁷ 「辛酉，……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清·畢沅，《新校續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2012），卷67，頁1654、1664。

³⁸ 元·脫脫等，《宋史》，卷337，〈范祖禹傳〉，頁10795；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474，元祐七年六月戊辰條，頁11307。

³⁹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外書卷第11，頁418。「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

⁴⁰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外書卷第12，頁444。（呂好問字舜徒，但宋人文集中亦有記為「舜從」者，應為呂切問之誤）

⁴¹ 宋·呂祖謙，〈東萊公家傳〉，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62冊，卷5894，頁39。

時因堅持講授「元祐學術」，被舉發罷職的李朴（1064-1128）。⁴²李朴之父李潛從游於呂好問兄弟，⁴³李朴本人是紹聖元年進士，曾被呂希哲薦任御史，⁴⁴亦曾擔任洛陽國子監學官，程頤「與之甚厚」。⁴⁵還因太過剛直，為程頤勸告，李朴反笑稱：「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令程頤改容謝之。⁴⁶之後蔡京當政時，有意高官厚祿請他出仕，亦為李朴嚴拒。⁴⁷

韓億（972-1044）家族中，韓絳（1012-1088）、韓維（1017-1098）均與二程交往密切，韓家下代亦然。韓綜（1009-1053）之子韓宗道（1027-1097）被記為二程的「相與質疑問道者」。⁴⁸韓維玄孫韓元吉（1118-1187）拜尹焞為師，又與朱熹（1130-1200）為友；⁴⁹韓宗武子韓璜則學於私淑程頤的胡安國，⁵⁰家族中有深厚的洛學傳統。程門弟子中出於韓氏網絡者，還有曾任參知政事的李若谷（970-1049）家族後人。李若谷與韓億是貧賤之交，兩家婚姻不絕。⁵¹程門中的李處廉就出自李家，⁵²其婿是韓億曾孫韓黯（1105-1153）。⁵³

⁴² 元·脫脫等，《宋史》，卷377，〈李朴傳〉，頁11656；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13，建炎二年二月辛未條，頁331。

⁴³ 宋·呂本中，《童蒙訓》（收入宋·呂本中撰，韓西山輯校，《呂本中全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上，頁972-973。

⁴⁴ 宋·呂本中，《童蒙訓》，卷上，頁1103。

⁴⁵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14，頁1110。

⁴⁶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8，頁524。

⁴⁷ 元·脫脫等，《宋史》，卷377，〈李朴傳〉，頁11656。

⁴⁸ 清·池生春、諸星杓，《明道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4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頁2474。

⁴⁹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7，〈和靖學案〉，頁1017。

⁵⁰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4，〈武夷學案〉，頁1189。

⁵¹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8，頁79。

⁵²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0，〈劉李諸儒學案〉，頁1081。

⁵³ 宋·洪適，〈韓承議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14冊，卷4745，頁21。

《二程集》中與程頤有諸多問答的李處遯（字嘉仲），原未記載其出身，⁵⁴但因另一位李家後人李處權（1086-1155）有詩〈送嘉仲兄赴永康宰〉，⁵⁵李處權既稱為「兄」，此處「嘉仲」的全稱應為「李嘉仲」，正與李處遯姓字吻合，可知李處遯亦為李若谷家族一員。而由紹聖四年，李處遯為程頤女婿席彥正（1057-1097）墓誌書丹一事，⁵⁶可知在紹聖年間，李家與程門後人關係依然緊密。

尹焞上代也與二程頗有淵源，一般以為他是元祐二年在國子監就讀時，由蘇昞推薦入門。⁵⁷但其母陳氏出身陳堯佐（963-1044）家。⁵⁸尹焞稱為「舅氏」的陳知儉（1035-1080）是二程友人，⁵⁹二程均有為其所作詩文。⁶⁰據尹焞弟子，也是韓維四世孫韓澆（1159-1224）所記，陳堯佐玄孫陳恬（1058-1131）「從伊洛諸公遊」，⁶¹此處的「伊洛諸公」顯然包括二程。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程顥於元豐八年過世時，陳恬有贊致意，⁶²推許程顥「惟德溫溫，……洞暢今古，鈎深窮微」。⁶³以尹焞上代與二程的關係，可能早有機會接觸程學。

⁵⁴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14，頁1109。

⁵⁵ 清，厲鶚，《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41，頁1048。「李處權，……字巽伯，洛陽人，邯鄲公淑曾孫」。李處權，〈送嘉仲兄赴永康宰〉，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32冊，卷1829，頁20364。

⁵⁶ 宋·劉立之，〈宋故安定席處士墓誌銘〉，收入何新所編，《新出宋代墓誌碑刻輯錄（北宋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第6冊，頁161。

⁵⁷ 宋·黃士毅編，《和靖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6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頁3581。

⁵⁸ 宋·尹焞，〈尹林妻陳氏墓誌〉，收入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第2冊，頁635。

⁵⁹ 宋·尹焞，〈書伊川先生修禊序帖〉，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505，頁46。

⁶⁰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文集卷第3，〈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頁486；同書，文集卷第8，〈禊飲詩序〉，頁584。

⁶¹ 宋·韓澆，《涇源日記》（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第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卷下，頁126。

⁶² 宋·晁說之，〈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30冊，卷2819，頁334。

⁶³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3，頁952。

二程表叔張載（1020-1077）的關中學友亦早已融入二程交遊圈。如程頤在《二程集》有回書答問的張閔中，⁶⁴其實是「藍田四呂」堂兄弟呂大雅（?-1107）的墓誌作者。張閔中不僅「頃年從君（呂大雅）遊，且久知君為詳」，又娶呂氏家族女子，⁶⁵無疑出自關中士人群體。「程門四先生」之一的呂大臨（1044-1092）雖於元祐七年（1092）過世，但呂家與程門一直聯繫密切。元祐之初，呂大防（1027-1097）便曾對在經筵的程頤講述風格提出建言。⁶⁶元祐八年，時任宰輔的呂大防也苦勸程頤再次出仕，見志不從，又贈以百緡，⁶⁷可謂關懷備至。程頤也有「呂進伯（呂大忠）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的說法。⁶⁸

劉唐老、劉唐詢是劉忱之子，⁶⁹曾祖劉溫叟（909-971）官至御史中丞，祖父劉燁（968-1029）曾為龍圖閣直學士、伯父劉幾（1008-1088）、父親劉忱均至高位，是仕宦大族出身。⁷⁰劉幾和二程的交遊圈多有重疊，與司馬光、文彥博、富弼（1004-1083）同是耆英會成員，⁷¹現存還有韓維、呂大鈞（1031-1082）與他的往來詩文。⁷²劉唐詢是明文記載的程門弟子，⁷³很可能也是在元祐年間拜入程門。據尹焞所言：「焞登先生（程頤）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揆（朱光庭）給事所編先生雜說，焞欣然受之。」⁷⁴劉唐詢

⁶⁴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51。

⁶⁵ 宋·張閔中，〈宋承務郎致仕呂君墓誌銘〉，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343。

⁶⁶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01。

⁶⁷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21-222。

⁶⁸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卷第2上，頁38。

⁶⁹ 清·王昶，《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128，頁6。「提點刑獄尚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祠下，男唐工、唐老、唐純、唐傑、唐詢侍行。」

⁷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262，〈劉溫叟、劉燁傳〉，頁9072-9074。

⁷¹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10，頁104。

⁷² 宋·韓維，〈和伯壽秘監〉，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8冊，卷245，頁5218；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景印藁藻堂本四庫全書叢要》，第26冊，臺北：世界書局，2015），卷1，頁11。

⁷³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128，頁6。

⁷⁴ 宋·尹焞，〈題伊川先生語錄〉，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053，頁44。

的堂兄弟劉唐聰還與「程門四先生」之一的呂大臨是連襟，⁷⁵與程門關係密切。

劉唐老在元祐五年（1090）任太常博士時，曾建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欲詔經筵訓釋，以備觀覽」。⁷⁶以《大學》為「入德之序」的說法，和程頤「《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的說法可說如出一轍。⁷⁷而他特地強調要在經筵講習《大學》，也是二程首發，希望君主能以「格致誠正」工夫平治天下的論述。⁷⁸無論是否師從程門，劉唐老的這一番言論，顯示了他對程頤的學術應該有相當程度的信從。

邵雍（1012-1077）是二程學友，和呂公著、韓絳等均熟識，呂公著之子呂希哲、呂希績和呂希純皆「師事康節（邵雍）」。⁷⁹在邵雍過世後，其子邵伯溫（1057-1134）和其孫邵溥、邵博（?-1158）仍與程家往來甚密。據載：「（邵）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紹聖初，執政章惇（1035-1106）仰慕邵雍，有意籠絡，邵伯溫推辭不往。當程頤感慨自己拖累了他時，邵伯溫則回答：「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⁸⁰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

在「再世交」以下，邵溥「嘗及伊川之門」。⁸¹大觀元年，程頤過世，許多門人畏懼黨禍，不敢前來，邵溥是少數堅持前往送

⁷⁵ 劉唐聰為劉幾之子。參見張應橋，〈北宋劉幾墓誌考釋〉，《四川文物》，2011：3（成都，2011.6），頁67。劉唐聰、呂大臨均娶陳安仁之女。宋·范純仁，〈朝請大夫陳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71冊，卷1558，頁355。

⁷⁶ 宋·劉唐老，〈乞令經筵大臣訓釋大學上進奏〉，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11冊，卷2408，頁215。

⁷⁷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經說卷第5，〈伊川先生改正大學〉，頁1129。

⁷⁸ 紀晏如，〈二程治道論的內涵及其思想史背景〉，《中正歷史學刊》，19（嘉義，2016.12），頁53-90。

⁷⁹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12，頁127。

⁸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433，〈邵伯溫傳〉，頁12852。

⁸¹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0，〈劉李諸儒學案〉，頁1081。

葬的弟子之一。⁸²邵博可能因為年幼，只記載了自己「蚤見伊川」的印象。此外，邵博又「與伊川族弟（程）穎善」，⁸³這位程穎正是二程高徒朱光庭（1037-1094）女婿。⁸⁴此外，邵雍「撫之如子」的友人遺孤周純明，日後入了二程門下，⁸⁵邵博在文字中亦稱其為友。⁸⁶

富弼外孫范之才（字文甫）、范之翰（字申甫）也是明文記載的程頤弟子。⁸⁷在楊時之子楊迪（1055-1104）所記的語錄中，可以看到「范文甫」與程頤有多則問答。⁸⁸范之才當時最著名的身分，除了富弼外孫，就是程頤門人，某次范之才向劉安世（1048-1125）請教，劉安世的答覆卻是：「君富文忠外孫，程正叔門人，使某何所措詞？」⁸⁹且不論劉安世不願作答的心態為何，在他看來，范之才的富弼外孫、程頤門人身分，要遠超過他本身的官職或父系。同時，晏殊（991-1055）曾孫晏敦復（1075-1145）也是程氏門下，晏殊是富弼岳父，⁹⁰富弼兩個外甥范之才、范之翰皆為程頤門人，程頤之婿李偁在為官前也曾在富弼門下擔任門客。⁹¹以上這

⁸²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4，頁974。

⁸³ 宋·邵博撰，夏廣興整理，《邵氏聞見後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卷6，頁43。

⁸⁴ 何新所、賈倩，〈北宋理學家朱光庭祖父朱文郁墓誌考釋〉，《語文知識》，2013：4（鄭州，2013.12），頁8-11。

⁸⁵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3，〈王張諸儒學案〉，頁1162。

⁸⁶ 邵博曾言：「先友周全伯（周純明字全伯）喪嫡母。」宋·邵博撰，夏廣興整理，《邵氏聞見後錄》，卷6，頁43-44。

⁸⁷ 宋·呂本中撰，查清華、胡儉整理，《師友雜誌》（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16。

⁸⁸ 「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卷第22上，頁280。

⁸⁹ 宋·陳長方撰，許沛藻整理，《步里客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卷上，頁5。

⁹⁰ 宋·范純仁，〈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行狀〉，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71冊，卷1556，頁324。

⁹¹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3，頁26。「富公之客李偁」。

些人的聯繫也可以看出，二程關係網絡從上代一直向下延續的狀況。

在這群弟子中，與二程原有網絡較疏者只有吳給。吳給之祖吳奎（1011-1068）以進士起家，官至參知政事，⁹²吳給本身官至徽猷閣待制，⁹³根據胡安國所記，南宋程門弟子再度被起用時，吳給是與楊時、劉安節（1068-1116）等人同列的地位。只有在考察他的出身時，會發現他與呂希純等人類似，均是出身北方、歷代仕宦的家族。⁹⁴

此一群體中並非沒有反面例子，如「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的郭忠孝（?-1126）。⁹⁵郭是洛陽人，祖父為武官，父親郭達（1022-1088）以蔭入仕，受范仲淹（989-1052）賞識，「勉以學問，待之如子侄」。⁹⁶郭忠孝亦由蔭得官，⁹⁷他的姊妹嫁給呂公著姪孫呂昭問，⁹⁸郭忠孝本人則「受《易》、《中庸》於小程子」。⁹⁹像這般與程家淵源深厚者，一樣會有背師之舉。不過就整體而言，這群來自於二程原初關係網絡的門人在學禁中雖多遭橫逆，基本上在北宋末年，仍形成了程門一個中堅群體。

此外需說明的是，史籍中亦有記載其他向程頤問學者，如謝

⁹² 宋·劉敞，〈吳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69冊，卷1506，頁230。

⁹³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0，〈劉李諸儒學案〉，頁1074。

⁹⁴ 宋·劉敞，〈吳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69冊，卷1506，頁230。

⁹⁵ 宋·朱熹，〈答程允夫〉，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卷41，頁1871。

⁹⁶ 宋·范祖禹，〈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98冊，卷2151，頁338。

⁹⁷ 宋·曾肇，〈范忠宣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10冊，卷2283，頁118。

⁹⁸ 宋·范祖禹，〈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98冊，卷2151，頁338。

⁹⁹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28，〈兼山學案〉，頁1026。

絳（994-1039）之孫謝悛、范仲淹外孫周鏐等，¹⁰⁰但僅是問學，似乎並不能就將其視為程門，故不將此類人士納入。又如《宋史·程頤傳》中與朱光庭並稱的「門人賈易」。¹⁰¹但賈易本傳中，反倒沒有從學二程的記載，¹⁰²其他一手史料亦無賈易從學二程之說。對此學者曾有考證，賈易當時另有「出韓氏門下」之說。¹⁰³考慮到韓維與二程的關係，賈易可能被視為與程頤一黨，但是否屬門人必須持保留態度。又如徽宗朝曾任宰執的趙挺之（1040-1107），被呂陶（1028-1104）稱為「從程頤學」，¹⁰⁴但趙挺之在政治上游離於新舊兩黨，¹⁰⁵在史料中也未曾見他與程頤或程門直接接觸，故不予列入。

¹⁰⁰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卷第21上，頁268-269；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6，〈士劉諸儒學案〉，頁269。

¹⁰¹ 元·脫脫等，《宋史》，卷427，〈程頤傳〉，頁12720。

¹⁰² 元·脫脫等，《宋史》，卷355，〈賈易傳〉，頁11173-11175。

¹⁰³ 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76。

¹⁰⁴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03，元祐二年秋七月乙丑條，頁9818。

¹⁰⁵ 霍無忌，〈趙挺之與宋徽宗朝前期的政局演變〉，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二十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頁73-92。

四、元祐、紹聖開始出現的無淵源南方弟子： 以太學生為主

表 2 無淵源南方弟子

1、群體	無淵源東南弟子（22人）
2、時間	元祐、紹聖間為主
3、地點	東南
4、性質	太學生為主，後多成進士
5、人物	
溫州	周行己、許景衡、沈躬行、劉安節、劉安上、戴述、鮑若雨、謝佃、潘旻、陳經正、陳經邦、陳經德、陳經郭
福建	練繪、王蘋、羅從彥
常州	周孚先、周恭先、唐棣
四川	謝湜、譙定
汝陰	袁溉
6、關鍵詞	東南出身、太學生、平民家族、起家第一代、鄉里領導

資料來源：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宋·周行己，《浮沚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7，〈戴明仲墓誌銘〉，頁166；宋·黃震著，《黃氏日鈔》，收入何忠禮、張偉主編，《黃震全集》，第4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元祐、紹聖以後，東南太學生成為程門一個主要群體（詳見「表2」），¹⁰⁶他們的出現可能基於幾個政治、社會因素：（a）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朝太學招收人數增加；（b）程頤先為帝師、後掌國子監，聲望日隆，（c）南方士人在北宋中期的崛起。本節將分析他們的群體特質，並嘗試結合歷史背景進行解釋。

東南士人的發跡可以追溯到唐末，但他們在科舉、門蔭之途往往比不過早已建立優勢的山東世族，多半僅能出任中下層官

¹⁰⁶ 「東南」一詞在宋代指涉的地區經濟和文化並不完全相同，在此大抵以賈志揚的《宋代科舉》中列舉「江南東、西路，兩浙路與福建路」為劃分。參見：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202-203。

員。但隨著唐末五代大亂，前往京師變得充滿險阻，吸引力也大大降低。東南士人與其家族大多轉向當地或鄰近的自立政權，或妥協、合作以求自保，甚至成為他們的得力助手。¹⁰⁷入宋後，對南方降臣雖頗猜忌，但因南方有先前避禍南下、文化程度較高的北方移民，東南士人在科舉場中很快取得了優勢，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朝時，東南士人已經成為進士的主要來源。¹⁰⁸

北宋太學改革始於熙寧（1068-1077）年間，無論是學生人數、補官制度都有了長足的改善。為太學生提供住宿、飲食等補助，另有遠道補貼、供給校舍等，為不寬裕的學子解決了後顧之憂。¹⁰⁹而且在京師求學，更能得知學術風向，比在家鄉讀書應舉更為有利。¹¹⁰另一方面，學生升入太學後有一系列考核，¹¹¹希望釋褐補官的學子可能逗留太學五至七年之久，¹¹²如此也增加了外地學子在汴洛求師問學的機會，還可以和校外名士一起遊學。¹¹³

洛學原就重視由教育陶冶學生心性，不難想見程頤對最高教育機構的重視。他在元祐元年，就與孫覺（1028-1090）、顧臨同修國子監條例。¹¹⁴在元祐二年辭去侍講位後，程頤回到洛陽，受任

¹⁰⁷ 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21。

¹⁰⁸ 賈志揚，《宋代科舉》，頁180。並見其第六章。

¹⁰⁹ 王永顏，〈宋代中央官學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行考核活動〉，《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徐州，2017.5），頁104-105。

¹¹⁰ 楊萬里，〈林石與溫州「太學九先生」之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北京，2010.3），頁149-155。

¹¹¹ 學者指出，太學選士的另一面，是對太學的管理更加嚴格，從學生的學習、晉升到講師的職權，都受到規章約束，甚至教師和學生私下會面也被禁止。對學術思想更是牢牢掌控，不允許講授新學之外的學問。參見：Chu Ming-kin（朱銘堅），*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73-119.

¹¹² 陳安金，〈論北宋中後期制度轉型與溫州士子的機遇〉，《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溫州，2007.11），頁34-35。

¹¹³ 王永顏，〈宋代中央官學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行考核活動〉，頁104-105。他們交接名師，也很可能是經由同學介紹，如元祐年間，尹焞也在國子監就讀，可能介紹同時在太學的同學入門。參見：宋·黃士毅編，《和靖先生年譜》，頁3581。

¹¹⁴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154-155。

勾管西京國子監。洛陽素是人文薈萃之地，一般執掌西京國子監者多為名流，位高職閒，屬於「優賢」禮遇。¹¹⁵程頤在辭去教導哲宗之任後，在國子監也不僅受優退禮遇，仍「專主教導」，¹¹⁶用心傳道育人，直到元祐五年，程頤因丁憂去職為止。元祐七年，程頤服除，朝廷仍有意聘請他回任重掌國子監。¹¹⁷雖為其所拒，但朝廷對程頤學術仍甚為尊崇。

舊黨一般認為，學校考試帶來了惡性競爭，教育成果也很難被公正評估。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應該是培養道德，招聘官員僅僅是次要。因此，元祐年間太學回歸原有的養士功能，不再擁有釋褐官人之權，¹¹⁸所受到的控管較神宗朝放鬆許多。¹¹⁹另外，當時在太學，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¹²⁰這樣類似同鄉會性質的聚會，可能在交換鄉里消息的同時，也提供了學子們結識程門同鄉的機會，甚至由這些同鄉接引，成為新一代的程門弟子。

少了繁瑣規章並不代表態度放任，程頤和親信弟子們對太學一直頗為用心，即使在程頤去職後也不例外。除了程頤在元祐元年，就投身修訂國子監條例，程門弟子先後任職太學者計有：元祐元年九月，劉絢（1045-1087）為春秋博士，十月蘇昞任太學教

¹¹⁵ 張祥雲，〈北宋西京國子監考探〉，頁75。

¹¹⁶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6，〈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頁557。

¹¹⁷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04、211、216。

¹¹⁸ 值得注意的是，程頤對於變法中，以太學三舍法作為取士之途並不反對，只是希望將熙豐年間分散到各學官的取士之權，集中到國子監祭酒和司業手上。然而他的意見並沒有被採納，朱銘堅，〈黨爭漩渦中的太學——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新史學》，29：2（臺北，2018.6），頁80-81；Chu Ming-kin,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pp. 120-180.

¹¹⁹ 神宗對太學的控管是前所未有的，太學得到重視的另一面是全面監管，從學生的學習和晉升到講師的責任和職權，都受到規章制度的約束。甚至教師和學生私下會面也被禁止。參見：朱銘堅，〈黨爭漩渦中的太學——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頁77-80。

¹²⁰ 宋·朱彧撰，李偉國整理，《萍州可談》（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頁141。

授，¹²¹元祐二年呂大臨為太學博士，¹²²元祐七年游酢（1053-1123）任太學博士。¹²³曾教授西京國子監的李朴，程頤也「與之甚厚」。¹²⁴紹聖元年，楊時還有信詢問游酢太學近況。目前雖然沒有程頤執掌洛陽國子監的一手文獻，但相信他應當投注了不少心力，這可能也是元祐以後，程門加入了許多太學生新血的緣故。此時加入弟子如周行己也表明自己是在太學受到「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感召，¹²⁵而「學聖人」基本上是程門為學綱要。¹²⁶可惜變法派在紹聖元年重新掌握太學，程門弟子在太學也盡遭清除。¹²⁷

（一）元豐九先生：溫州永嘉家族間婚姻網絡突顯出的程門群體

在北宋，東南地區雖文化昌盛，但發展並不平均。一直到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仁宗朝，溫州仍是所謂的「僻遠下州」。儘管在「九先生」之前，先後有明州楊杜五子及儒志、經行兩先生，但聲望均僅止步州縣。¹²⁸元豐（1078-1085）年間改革太學制度，提升了每路的太學生人數及解額，也提供了溫州學子更多機會，¹²⁹可能是他們在太學嶄露頭角的重要原因。

在程門學子中，「元豐九先生」是特別突出的一群。他們分

¹²¹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164。

¹²²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丙寅條，頁9652。

¹²³ 清·游智開，《游定夫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四川：成都大學出版社，2003），頁3388。

¹²⁴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8，頁524。

¹²⁵ 宋·周行己，《浮沚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5，〈上祭酒書〉，頁51-52。

¹²⁶ 鍾彩鈞，〈二程聖人之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頁281-292。

¹²⁷ 朱銘堅，〈黨爭漩渦中的太學——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頁108。

¹²⁸ 王鳳賢，〈北宋——浙東學術的「草昧時期」〉，《浙江學刊》，1990：5（杭州，1990.10），頁52-62。

¹²⁹ 朱海濱，〈宋代溫州科舉的興盛及其背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杭州，2015.10），頁54-55；陳安金，〈論北宋中後期制度轉型與溫州士子的機遇〉，頁32-37。

別是：周行己、趙霄（?-1109）、許景衡（1072-1128）、沈躬行、劉安節、劉安上（1069-1128）、戴述（1074-1110）、張輝（1064-1118，原名應為張輝）、¹³⁰蔣元中，九人均出身溫州永嘉（今浙江省溫州市）。¹³¹最初是周行己在趙霄墓誌中，提到在元豐時，九名永嘉太學生「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永嘉後進葉適（1150-1223）也稱他們是「元豐時，同游太學者」。¹³²但「九先生」中，有三人是私淑，僅有六人及於程門，¹³³且大抵要到元祐、紹聖年間才拜師。¹³⁴

與其說「元豐九先生」為永嘉學子從學程門之先，不如說以家族、婚姻原有的緊密聯繫，使得他們在程門成為格外突出的學術群體。「九先生」和永嘉先輩名儒丁昌期、林石（?-1101）之間，以學緣、血緣構成的學術傳播路徑，前人已有不少研究。本文除稍做補充，將著重分析「九先生」與其他南方學子特質，以期彌補以往目光多集中於「九先生」的遺憾。

「九先生」家族間多有婚姻關係。戴述娶劉安上之妹；¹³⁵趙霄之弟，私淑洛學的趙霑娶沈躬行姊妹。¹³⁶此外，根據新出土墓誌，再加上周行己為張輝所作祭文，稱他與張輝為「仲氏懿親，同學良友」，可知張輝的姐姐應是嫁給了周行己從弟周成己。¹³⁷

¹³⁰ 據新出土張輝墓誌顯示，元豐九先生中的「張輝」應為「張輝」，故本文使用「張輝」之名，並於此註明。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收入《溫州文獻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89。

¹³¹ 周夢江，〈試論永嘉「元豐」九先生〉，《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5（杭州，1991.10），頁20-27。

¹³² 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10，〈溫州新修學記〉，頁178。劉安節、劉安上、許景衡、戴述應在元祐年間入太學，趙霄、張輝、周行己應在元豐年間。周夢江，〈試論永嘉「元豐」九先生〉，頁20-27。

¹³³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頁1131。

¹³⁴ 周夢江，〈試論永嘉「元豐」九先生〉，頁20-27。

¹³⁵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戴明仲墓誌銘〉，頁166。

¹³⁶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誌銘〉，頁83。

¹³⁷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90。

許景衡姐姐則是嫁給劉安節之弟劉安義，¹³⁸由許景衡在寫給趙彥章的祭文中有「而我與子，總髮嬉戲，匪親之好」，¹³⁹知道他與趙彥章是親戚，趙彥章又是趙霄族兄弟。¹⁴⁰此外，許景衡之母表弟名沈藻，字子文，曾祖沈廷珍，祖父沈坦，父沈惟卿，有兩個兒子，名為沈尚行、沈義行，和沈躬行一樣，同是瑞安（今浙江省溫州市瑞安）人。¹⁴¹而沈躬行祖父名沈惟欽，父親名沈度（1034-1094），字子正，又有兄弟名沈志行、沈夷行。¹⁴²由名字行輩推斷，有很大可能同屬一家。

「九先生」不僅家族間互為婚姻，連從學也與家族網絡大有關係。丁昌期和林石在永嘉原就小有名氣，桃李成蹊。拜入程門前，劉安節就曾分別從學於丁、林二人，¹⁴³沈躬行早歲亦曾從學林石。¹⁴⁴他們之所以會從小拜入丁、林門下，可能是如陳傅良（1137-1203）所言：「往時吾鄉尚名德，貴門第，士大夫不苟為婚友。」¹⁴⁵當地士人對於婚姻、交遊皆是相當謹慎。由於林石之子林晞顏娶了沈躬行姊妹，丁昌期之子丁寬夫娶劉安上之妹。¹⁴⁶依照宋人均由父母長輩議婚的習慣，丁、林、沈、劉這幾家，必定

¹³⁸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48。「元修蓋左史弟安義」。

¹³⁹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卷18，〈代家兄祭趙彥章文〉，頁340。

¹⁴⁰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48。「（趙）彥章蓋（趙）彥昭群季。」

¹⁴¹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20，〈沈君墓誌銘〉，頁360。

¹⁴² 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15，〈沈元誠墓誌銘〉，頁277。

¹⁴³ 宋·劉安節，〈為林思廉祭林介夫〉，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37冊，卷2962，頁274。「曾謂君子，肯賜之教……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宋·劉安節，〈祭丁逢辰〉，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37冊，卷2962，頁271。「先子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

¹⁴⁴ 「（沈躬行）始從與塘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卷3，頁77。

¹⁴⁵ 宋·陳傅良，〈馮司理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68冊，卷6056，頁272-273。

¹⁴⁶ 蘭軍，〈學緣與血緣——北宋永嘉學術傳衍路徑探究〉，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二十六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408-419。

最遲在沈躬行、劉安上的父輩便已熟識。「九先生」中，即使是未記載從學丁、林兩人者，也與他們另有親屬關係。如周行己曾祖與丁昌期祖父交好，將女兒嫁給丁昌期之父（故周行己姑婆為丁昌期母），¹⁴⁷許景衡又是丁昌期夫人蔣氏親戚，¹⁴⁸幾個家族在上代早已互相嫁娶、份屬親友，很有可能也將孩子送給家族間信得過的有名學者教導。¹⁴⁹

從家族衍生出的學緣，是否也是「九先生」日後選擇程學的一個契機？林石早年跟從管師常學《春秋》，是胡瑗（993-1059）、陳襄（1017-1080）再傳，¹⁵⁰由於王安石（1021-1086）當政時，有意廢棄《春秋》，林石因而隱居鄉中，以《春秋》教授諸生。¹⁵¹劉安節在其墓誌中，稱「一時諸公，舍己請從」，¹⁵²雖然不知受教者確切有誰，但在當地顯然頗有影響。周行己更是將林石與名滿天下的程頤、呂大臨並列，認為是「皆傳古道，名世宗師」。¹⁵³雖然這個形容看似過重，但如果由「九先生」的立場來看，林石師從胡瑗、陳襄，不喜王安石學術，是否早為「九先生」日後埋下了邁向程學的種子？由於林石並未留下著作，後人

¹⁴⁷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丁世元墓誌銘〉，頁81。

¹⁴⁸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8，〈祭丁二丈文〉，頁337。「往拜夫人，重敘姻媿，言念伯兄，泣焉其潛。」

¹⁴⁹ 雖然明文記載為林、丁學生的只有劉安節、沈躬行兩人，但劉安節在林石墓誌中，稱「一時諸公，舍己請從」，周行己更是將林石與名滿天下的程頤、呂大臨並列，認為是「皆傳古道，名世宗師」。有學者認為這是「九先生」皆從林學的證明（參見：蘭軍，〈學緣與血緣——北宋永嘉學術傳衍路徑探究〉，頁408-419；楊萬里，〈溫州「太學九先生」的學術及其文學創作〉，《文學遺產》，2010：6〔北京，2010.11〕，頁75-83。）筆者不敢如此武斷，但應可做為一個合理的推測。

¹⁵⁰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5，〈古靈四先生學案〉，頁247；同書，卷32，〈周許諸儒學案〉，頁1137。程頤少時聲名鵲起，就是在太學受到胡瑗賞識，陳襄也曾先後舉薦程頤、程顥，稱讚兩人學行。參見：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16、66、77。

¹⁵¹ 宋·陳傅良，〈新歸墓表〉，收入曾叢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68冊，卷6057，頁287。

¹⁵² 宋·劉安節撰，陳光熙點校，《劉安節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卷2，〈為林思廉祭林介夫〉，頁44。

¹⁵³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誌銘〉，頁83。

「九先生」中，全無史料的蔣元中是否有可能置身於此一網絡之中？筆者推測，蔣元中很可能出身於丁昌期之妻，也是許景衡親屬的蔣家。由於許景衡自承與丁昌期夫人蔣氏為親屬，曾為丁夫人堂兄弟蔣稟（1042-1111）作墓誌，稱蔣家世居永嘉，自蔣稟祖父蔣絳起便「以文行望於鄉」，之後子孫「皆業儒世其家」。¹⁵⁵考慮到「九先生」自上代起便多有交集，如果蔣元中和他們全然無親無故，也令人懷疑他是否能憑身為「九先生」的太學同學，就被納入「九先生」之列？故筆者推測，蔣元中應屬於這個永嘉當地關係網絡一環，且很可能就出自與丁昌期、許景衡有親屬關係的蔣氏一家。

選擇程門可說令「九先生」的政治生涯屢經風浪。紹聖年間，對「元祐學術」展開全面反撲，繼續支持程學，將大有違於求仕進之路。¹⁵⁶如周行己自述他為學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從元豐六年（1083）十七歲入太學時起的思想轉折：先是一心求仕，學科舉程文；而後讀書漸廣，發現古文方是文章正宗；再深入後又發現經典深意，「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¹⁵⁷這樣的心路歷程，想必對「九先生」來說並不陌生。在元祐前進入太學的周行己和趙霄，更經歷了在元祐、紹聖間新學起落的過程，對於如何選擇學術會有更切身的體認。也因此後人在描述時，會說他們是「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黜」，¹⁵⁸情願在仕途上選擇一條艱難的道路。

「九先生」中，周行己是元祐六年（1091）進士，¹⁵⁹許景衡是紹聖元年進士，¹⁶⁰劉安節、劉安上分別是元符三年、紹聖四年進

¹⁵⁵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20，〈蔣君墓誌銘〉，頁107。

¹⁵⁶ 陸敏珍，〈「違志開道」：洛學與永嘉元豐九先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廣州，2009.11），頁108-114。

¹⁵⁷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5，〈上祭酒書〉，頁51-52。

¹⁵⁸ 宋·留元剛，〈劉左史集序〉，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315冊，卷7212，頁31。

¹⁵⁹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第2冊，頁440。

¹⁶⁰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453。

士，¹⁶¹只有沈躬行疑似止於太學生。在此無法詳考新舊黨爭對他們仕途造成的影響，可以知道的是，在大觀三年（1109），程頤過世的兩年之後，周行己還因「師事程頤」被御史彈劾，罷歸回鄉講學。¹⁶²日後胡安國在奏狀中，將許景衡、劉安節與程門高弟楊時並稱，同列為程氏門人代表。¹⁶³顯然這些當初親炙程頤、「違志開道」的永嘉學子，在政局浮沈中，都沒有忘記自己求道的初衷。

（二）以進士、太學生為主的其他溫州、南方學子：非家族親友牽引入門

在「九先生」外，尚有許多入門並不晚於他們，以進士、太學生為主的溫州學子。但同為永嘉出身，他們與「九先生」所受到的矚目程度卻大不相同。本節擬探索他們的出身背景，分析與「九先生」有何異同。

永嘉出身，被元祐二年從學的尹焞尊稱「先輩友兄」的謝佃，¹⁶⁴在陳傅良筆下，有與許景衡、沈躬行一同從學程頤、呂大臨的記載，¹⁶⁵入門應當在呂大臨過世（元祐七年）之先。亦有為永嘉出身、「久從伊川」，可能與劉安節同時在太學的鮑若雨。¹⁶⁶

與謝佃、鮑若雨同時從學者還有潘旻。¹⁶⁷潘旻出身瑞安，他

¹⁶¹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485、468。

¹⁶² 清·孫鏘鳴，《浮沚先生年譜》（收入周德明、吳建偉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頁3。

¹⁶³ 宋·胡安國，〈奏狀節畧〉，收入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附錄，頁348。

¹⁶⁴ 宋·尹焞，〈答謝用休書〉，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053，頁37。

¹⁶⁵ 宋·陳傅良，〈重修瑞安縣學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68冊，卷6054，頁238。

¹⁶⁶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外書卷第12，頁431、435。劉安世為元豐進士，應不可能與鮑若雨、劉安節同在太學，疑為「劉安上」之誤。

¹⁶⁷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94。

見當時黨禍正烈，隱居不仕。¹⁶⁸因此只能看到他在《二程集》中的幾則問答，家世、父祖都無從說起。由於元祐以後，學禁屢興，紹聖四年六月，程頤被送涪州編管，一直到元符三年才返洛陽。而由以上謝佃、鮑若雨、潘旻與許景衡、劉安節等人同時在洛從學的記載來看，他們入門應該不會晚於許景衡登科的紹聖元年。¹⁶⁹

稍晚入門的陳經正、陳經邦、陳經德、陳經郭兄弟也出身溫州（今浙江省溫州市），陳經邦是大觀三年進士，¹⁷⁰陳經正、陳經德有與程頤問答留存，應在洛陽待過一段時間。在同門中，楊時與陳經邦、經德「游厚善」，¹⁷¹陳經德也從遊於許景衡，由許景衡為陳家兄弟祖父所作墓誌，可知許、陳相識於崇寧二年之前，¹⁷²有可能經由楊、許介紹拜師。

文教之風鼎盛的福建（福州、建州和南劍州）和常州，也孕育了不少程門弟子。福建在唐宋之際號稱「東南全盛之邦」，¹⁷³常州也「號稱東南儒學之盛」，北宋時有籍貫可考的進士，最多是建州，有789人，其次福州548人，第三即為常州的500人。¹⁷⁴程門弟子中，練繪、王蘋（1082-1153）和羅從彥（1072-1135）便是繼楊時、游酢之後的閩人後進。周孚先、周恭先兄弟及唐棣等人則是常州出身。¹⁷⁵

¹⁶⁸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頁1143。

¹⁶⁹ 宋代進士登科後即釋褐（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604-605）。由此推斷，謝佃、鮑若雨若與許景衡同學於程門，應在他登科之前。

¹⁷⁰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547。

¹⁷¹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9，〈陳府君墓誌銘〉，頁348（崇寧二年作）；宋·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31，〈陳君玉墓誌銘〉，頁788。

¹⁷²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9，〈陳府君墓誌銘〉，頁348。

¹⁷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28，頁3685。

¹⁷⁴ 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態與科舉的地理闡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4（西安，2015.10），頁72-73。

¹⁷⁵ 江南東路常州轄下晉陵、武進、無錫、宜興。

福建學子背景都明顯與楊時有關。王蘋是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伯父王伯起與楊時弟子陳瓘（1057-1124）交好。¹⁷⁶王蘋自幼過繼伯父，程頤在涪陵及洛陽時，伯父「命蘋從遊，遂為河南高弟」。¹⁷⁷王蘋姐夫蔡君濟（?-1117）又是許景衡好友，本身私淑洛學，素日「以正心誠意為本」，¹⁷⁸這是在南方學子中，明顯看到由親緣關係帶出學緣的一個例子。

練繪是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人，為大觀三年進士，¹⁷⁹出身記載僅有「少同楊時遊程頤之門，頤甚器之」。¹⁸⁰楊時在元豐四年（1081）拜師後，僅在元祐八年赴洛拜見程頤，¹⁸¹故推測練繪若要與楊時一同「遊程頤之門」，可能是就在此時。

閩學關鍵人物羅從彥更與楊時脫不了關係。羅從彥是劍浦（今福建南平）人，與楊時同樣出身南劍州。他是先在家鄉拜見了楊時，又聽楊時稱道程頤，在元祐八年變賣田產，北上見程頤求道，在紹聖元年拜別程頤，全心跟隨楊時，「摳衣侍席二十餘載」。¹⁸²日後理學大師朱熹之父朱松（1097-1143）、老師李侗（1093-1163）皆出自其門下。

周孚先、周恭先兄弟來自兩浙路晉陵（今江蘇省常州市），在宋屬常州。建中靖國元年（1101），周孚先為太學生時，「過洛陽、遊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¹⁸³根據描述，可能是因

¹⁷⁶ 明·黃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舊志整理組、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整理，《八閩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卷63，頁672。

¹⁷⁷ 宋·范成大撰，陸振嶽校點，《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26，頁390。

¹⁷⁸ 宋·章憲，〈王著作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5冊，卷3118，頁64。

¹⁷⁹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550。

¹⁸⁰ 明·黃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舊志整理組、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整理，《八閩通志》，卷65，頁743。

¹⁸¹ 宋·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頁3394-3410。

¹⁸² 陳利華，〈羅從彥受學楊時考〉，《武夷學院學報》，2021：1（武夷山，2021.1），頁1-6。

¹⁸³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文集卷第9，〈答周孚先問並跋（周孚先跋）〉，頁615。

為程頤的學術聲望前來，經接觸後心服拜師，現存程頤語錄有一卷便是由其所錄。¹⁸⁴兄弟兩人在程頤逝後創立書院，傳授洛學。¹⁸⁵唐棣是常州（今江蘇省無錫市）人，政和五年（1115）進士。¹⁸⁶只是在由其編寫的二程語錄中，記載橫跨元豐到元符（1098-1100），較難確認他實際待在程門的時間。

出身四川者為謝湜和譙定，謝湜是梓州路金堂（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人，元豐八年進士，¹⁸⁷和謝良佐、周恭先同年，程頤有〈與金堂謝君書〉答問，他從學的年代眾說紛紜，¹⁸⁸不過至少能確定程頤和他是在被貶涪州的紹聖年間。¹⁸⁹譙定是涪州人，聽聞程頤講道於洛，特往見之，程頤被貶涪州期間，譙定也特地前往拜見，¹⁹⁰也是在學禁中未曾背師的一員。

袁溉是程門中唯一留下記載的汝陰（今安徽合肥）弟子，¹⁹¹由活動年代看來應是程頤晚年所收。袁溉「嘗舉進士」，不知是否有功名，但他與曾任樞密副使的王庶（?-1143）交好，王庶家中

¹⁸⁴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卷第20，頁266。

¹⁸⁵ 清·于琨修，清·陳玉璠纂，《〔康熙〕常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36冊，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22，頁467。

¹⁸⁶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604。

¹⁸⁷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2冊，頁406。

¹⁸⁸ 王象之和祝穆均有程頤在熙寧四年（1071），隨程珦赴漢州時相識，之後謫居涪州又見之說，但朱彝尊又稱是程頤被貶涪州（紹聖四年到元符三年〔1087-1100〕）時見。〈周許諸儒學案〉談及陳經正時有「謝持正（謝湜）之見伊川也，貴一（陳經正字）實介紹之」的說法，〈劉李諸儒學案〉中又引尹焯說佐證「（謝湜）當與劉絢同時」，顯然自相矛盾。參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74，頁4527；宋·祝穆撰，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65，頁1135；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91，頁3490；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2、30，〈周許諸儒學案〉、〈劉李諸儒學案〉，頁1143、1079。

¹⁸⁹ 程頤在〈與金堂謝君書〉中自稱居住在「忠涪間」，應當是忠州（今重慶市忠縣）、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之間。

¹⁹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459，〈譙定傳〉，頁13460。

¹⁹¹ 袁溉出身汝陰（今安徽合肥），在宋代屬京西北路，但合肥屬淮河以南，故在本文仍將其劃歸南方弟子群。

藏有二程遺書，袁溉原欲傳錄未得，後王庶因被彈劾遭貶，在紹興十三年（1143）卒於貶所，袁溉得知後，不遠千里跟從王庶諸子，傳錄其書，¹⁹²可見心意之誠。

自黨禁起，太學生成群結隊來學的景況雖不復見，但仍持續有新血流入。入門時間與程頤任教太學沒有重疊的太學生，可能是與其他程門弟子有來往，如和「九先生」為同鄉、與許景衡交好的陳經正；也可能因程頤聲名前來，如建中靖國（1101）年間來學的周孚先兄弟。綜觀這群南方弟子，有記載者大抵與「違志開道」的「九先生」一般，即便政局紛擾，仍堅持跟隨師門。如謝佃一直到南宋都還與尹焞聯繫，交換師門筆記；¹⁹³周孚先因身處東南，不及參與程頤葬禮，但他不畏黨禁，一聽到訃聞，便「馳至洛，歸而為城東書院，以祀二程」。¹⁹⁴在程頤已經逝世的大觀三年，陳經德都還與當時程門魁黨楊時「游厚善」。¹⁹⁵袁溉不遠千里傳錄二程遺書，謝湜、譙定在程頤被貶時不畏人言，前來問學；王蘋、羅從彥更是南宋傳承理學不能忽略的人物。其餘數人中，潘旻自甘恬淡，不願出仕，唐棣、鮑若雨各留下一卷師門語錄，他們生平雖少流傳，但多是「志趣高遠」、「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的記載，¹⁹⁶絕無背師文字。另外還有生平不詳，僅知道在紹聖四年程頤被貶時，護送他前往涪陵的翟霖。¹⁹⁷這些都是在師門風雨飄搖的情況下不離不棄，且有幸留下史料，供後人銘記的例子。

¹⁹² 宋·薛季宣，〈袁先生傳〉，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58冊，卷5796，頁48。

¹⁹³ 宋·尹焞，〈答謝用休書〉，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053，頁37-39。

¹⁹⁴ 清·于琨修，清·陳玉璫纂，《〔康熙〕常州府志》，卷22，頁467。

¹⁹⁵ 宋·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卷31，〈陳君玉墓誌銘〉，頁788。

¹⁹⁶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頁1142、1143。

¹⁹⁷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頁232、234。

（三）南方門人出身背景：宋代新型士人家族，以經濟資源而非朝廷世祿為後盾起家

程門這群南方弟子的出現，或可與當時的新興士人階層崛起的背景結合來看。北宋初期，原由半世襲的職業菁英把持政府，但在十一、十二世紀之交，官僚階層出現了一個轉型，任職官府的菁英家族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眾多地方仕紳家族。¹⁹⁸有學者將這樣的家族稱為大地主、商人和官僚的三位一體，亦有學者以經濟與教育為此類家族的根基，將其稱為在世卿、世祿消失後，宋元時期的士人家族典型。¹⁹⁹

這群南方弟子大多在這一代才具有太學生或進士身分，但家族方面多半較具規模、在鄉里居於領導地位，支持他們讀書的並非上代的朝廷俸祿，而是家中田產或經商所得。不可諱言，在宋代，儘管階層流動已經較唐代增加，但要在科舉中取勝，必須要長期準備，無法參加生產勞動。²⁰⁰換言之，家族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供養子弟讀書。

在南方弟子群中，前代確知有人出仕者僅有周行己和王蘋。²⁰¹周行己祖先雖有人為官，但他卻更強調出自己是因生於富貴，才有能力讀書，他說：

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

¹⁹⁸ 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著，易素梅、林小異譯，〈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轉型〉，收入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75-246。

¹⁹⁹ 漆俠，〈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收入漆俠，《知困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頁204-206；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254。

²⁰⁰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頁147-167。

²⁰¹ 《弘治溫州府志》載：「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祖豫，父泳，皆中第。」但經王宇考證，周泳應非周行己之父。參見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頁54-55。周行己另一位從祖父周況亦曾為官。參見：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代朝請祭金華縣君文〉，頁73；王蘋八代祖王榮起仕唐為尚書郎，其後仕宦不絕，到了宋代，王蘋伯父王伯起因薦舉出仕。宋·范成大撰，陸振嶽校點，《吳郡志》，卷26，頁390。

迫於粥之不暇，所以沉為下愚，終身不靈，以貽笞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於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為學。²⁰²

明白點出是「富有之家」的子弟方有能力為學。

由於宋代政府對地方控制有限，²⁰³地方官員往往要依靠地方上富戶協治理。他們在鄉里也多是與官府交涉，組織活動的領袖人物。「九先生」業師丁昌期家族正是這類「家或饒資，必被役於公」的身分。也因為他們協助處理地方事務「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因此頗富鄉曲之譽，²⁰⁵在鄉里間居領導地位。周行己家族除了長期協助地方官，戰亂時，亦有周家人出面領導，如周行己弟弟周承己就是在方臘（?-1121）亂時，率領鄉人抵禦身亡。²⁰⁶

劉安上、陳經邦家族均是經商致富。劉安上之父「警穎有志度」不僅經商致富，更廣置田產，供子弟讀書，日後劉安節、劉安上均考中進士，在南方弟子群中，是相當典型的代表。劉安節祖父雖有「攝長史」記載，²⁰⁷但結合劉家背景看來，應是由當地富戶充任州縣佐吏，²⁰⁸並非正式官職。

²⁰²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6，〈勸學文〉，頁57。可以想見這是當時有能力求學士子的一般情況。

²⁰³ 包弼德（Peter Kees Bol）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頁6-26。

²⁰⁴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259-262；黃純艷，〈北宋財政能力與國家治理〉，《史學集刊》，2021：5（長春，2021.9），頁14-19。

²⁰⁵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丁世元墓誌銘〉，頁81。

²⁰⁶ 明·王瓚、蔡芳編纂，胡珠生校注，《弘治溫州府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頁267。

²⁰⁷ 劉安節之父則是靠其子恩封宣義郎，並未真正出任。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9，〈宣義劉公墓誌銘〉，頁349。

²⁰⁸ 林煌達，〈唐宋州縣衙吏員之探討〉，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外交、軍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頁125-148。

陳經邦家族「家多貲」，²⁰⁹其父「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²¹⁰陳經邦自「髫齡讀書」，又希望遠離干擾，於是在自家門口建書閣，「鑿沼於其前，開圃於其側，環山屏列乎左右，帶水縈繞乎東西，日與諸友登臨於此，以讀書綴文為事。」²¹¹擁有如此讀書環境，也證明了陳家的財力。

由其他門人家中供給讀書的情況，也有跡可尋。沈躬行到洛陽讀書，費用都是由父親沈度資助。²¹²由於沈躬行族父沈藻之祖「以多貲為溫之瑞安著姓」，²¹³可推估沈家的經濟狀況應該不差。許景衡與其兄許景亮（1057-1113）、弟弟許少雄都是太學生，²¹⁴要供養三個兒子自幼讀書，不治營生，亦是所費不貲。同時許景衡「兄死事嫂謹慎，悉推家財予之」，²¹⁵家中顯然原有田產。戴述也是自幼讀書，未滿二十歲便試廣文館（入國子監之前考試）。²¹⁶成為太學生後又不滿於科舉之學，於是「益遊四方，求古所謂為己之學」。²¹⁷從這段敘述看來，戴述直到二十歲都沒有從事任何生產活動，進入太學後還繼續遊學，顯然必須有相當的經濟條件加以支撐。再者，在宋代，資助姻親讀書、從事舉業的情況並不少見。²¹⁸從前文已知，「九先生」間家族已相交數代，又互相聯姻，劉安節家族既號稱豪富，戴述娶劉安上之妹、許景衡之姐又嫁給劉安節弟弟，在經濟方面加以援助，應該也不是令人意外的情況。

²⁰⁹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9，〈陳府君墓誌銘〉，頁348。

²¹⁰ 宋·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卷31，〈陳君玉墓誌銘〉，頁788。

²¹¹ 宋·陳經邦，〈會文閣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35冊，卷2916，頁189。

²¹²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誌銘〉，頁83。

²¹³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20，〈沈君墓誌銘〉，頁360。

²¹⁴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許少明墓誌銘〉，頁78；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20，〈陳孺人述〉，頁366。「家弟少雄」。

²¹⁵ 宋·胡寅撰，容肇祖點校，《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26，〈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頁565。

²¹⁶ 姚瀛艇主編，《宋代文化史》（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111。

²¹⁷ 宋·周行己，《浮沚集》，卷7，〈戴明仲墓誌銘〉，頁84。

²¹⁸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103-136。

在「九先生」外，其他弟子所留下的側面記載，也能推斷出其家族的經濟不差。鮑若雨在方臘亂時，與當地鄉里領袖皆「鳩財積穀，陰合里中少年族中子弟，授以兵器，分地自保」。²¹⁹袁溉家「為汝陰盛族」，建有塢堡，遇「金人大至，欲以萬眾攻山後營」亦足以自保。²²⁰袁家明文記載為「盛族」，鮑家恐怕也不遑多讓，如非早有產業，恐怕也難以做到出錢購置糧食兵器，而能領導鄉人禦敵，應是鄉里間早有名望的領袖人物。

周孚先在程頤過世後，「歸而為城東書院以祀二程，生徒自遠至者，眾不能容，又於城西創書院，孚先主教於東，恭先主教於西。」²²¹對這筆史料，以往多側重周氏兄弟傳授洛學之功，但如對宋代書院稍作考察，應可對周孚先出身有更多瞭解。宋代書院基本上分為兩類，一是由官方出資，作為州縣官學；一則是由私人出資，用來教育本族子弟，甚至接納貧寒學子，故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²²²如劉安上之父經商致富，便「闢館裒書延師儒，趣諸子族人皆從學」。²²³程頤之所以能在元豐年間興建伊川書院，是因為得到了文彥博慷慨解囊，將「伊闕南鳴皋鎮，小莊一址，糧地十頃，謹奉構堂，以為著書講道之所」，有「田十頃，稅糧三十石」，交由鄉人耕種，除繳納錢糧以外，「供弟子飲食衣服之用」。²²⁴不僅有教學功能，還供給學生衣食。²²⁵周孚先之

²¹⁹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93；明·薛應旂，《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3冊，卷174，頁3047。

²²⁰ 宋·薛季宣，〈袁先生傳〉，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258冊，卷5796，頁47。

²²¹ 清·于琨修，清·陳玉璣纂，《〔康熙〕常州府志》，卷22，頁467。

²²² 張惠芬，〈論宋代的精舍與書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7：1（上海，1987.3），頁31-44。

²²³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卷19，〈宣義劉公墓誌銘〉，頁349。

²²⁴ 趙國權，〈洛學的發源地——伊川書院考略〉，《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10：4（南昌，2010.8），頁107-108。

²²⁵ 北宋書院與南宋乾道、淳熙年間興起的精舍、書堂性質不同。精舍不但規模較小，學子還必須自籌衣食，象山精舍甚至規定學子須親自參與耕種，相當清苦。張惠芬，〈論宋代的精舍與書院〉，頁31-44。

所以能成立城東、城西兩所書院，很可能便是得益於家族的經濟實力。

練繪的資料極少，只知道他是建州浦城人，筆者在此試圖結合歷史背景進行推論。宋以前，福建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北宋時建州進士數量卻突飛猛進，成為諸路首位，²²⁶這樣的變化主要來自於地方豪族的型態轉變。唐代晚期，土著大族多半以領導墾殖的州里豪強形象出現，進而成為唐末地方自衛武力的領袖。隨著地方政權的建立，先是被閩國吸收，擔任地方軍武將。進入南唐後，則開始由武轉文，入宋後，由於朝廷的重文政策與對南唐舊臣的壓抑，這些大家族又紛紛投入科舉考試，力圖朝士人家族轉型。²²⁷

練氏自唐末就是建州大姓，²²⁸出身浦城的真宗朝大臣章得象（978-1048），祖母便是練氏女子。練氏的智慧，使得建州在被南唐納入版圖時免於屠城的命運，更是為宋人津津樂道。²²⁹練繪既出身建州浦城，又姓練氏，也很容易讓人將他與這樣一個大時代背景聯繫起來。

同樣是福建路出身，由王蘋之父王仲舉（1044-1111）的墓誌，可知王家在西晉末年遷至福清，是為大族，八代祖王榮「仕唐為尚書郎，其後仕宦不絕」，五代祖王仁儻雖為閩王所聘，卻婉拒出仕。²³⁰直到入宋以後，自祖父王礎才「試於禮部」，伯父王伯起、父親王仲舉也從學讀書。再加上王仲舉「生事牢落，治田百

²²⁶ 唐代建州範圍大致包括了北宋建州、南劍州與邵武軍三地。吳修安，〈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家族與社會〉，《新史學》，29：4（臺北，2018.12），頁3。

²²⁷ 吳修安，〈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家族與社會〉，頁58-60。

²²⁸ 吳修安，〈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家族與社會〉，頁21；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41，〈地理五〉，頁1064-1065。據《新唐書》記載：武德四年（621）置建州。期間建州曾改名為建安郡。下轄建安、邵武、浦城、建陽、將樂五縣。

²²⁹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整理，《涑水記聞》（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第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9，頁116。

²³⁰ 宋·江公望，〈王聖俞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21冊，卷2621，頁349。

畝」的記載，²³¹顯示王家也頗富貲財。如對照福建發展歷史，王家應是在中晚唐福建士人興起，地方豪族紛紛投入科舉，朝士人家族轉型的潮流之中，逐漸參與到執政的隊伍，而這樣的機會，基本上是屬於當地盛族的專利。²³²

羅從彥家族是在閩王王審知（862-925，909-925在位）入福建時，作為節鉞的「七姓」之一。²³³又「鄉聚族百餘，皆羅姓」，地名甚至因此改為「羅源」，²³⁴規模相當不小。但羅從彥的父祖「皆不仕」，也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佐證，羅家是否跟練繪、王蘋家族一般在當地成為豪族？或在由唐入宋的過程中有過什麼起伏？同樣地，謝佃、潘閔、唐棣的出身不詳，亦無更多記載可供推測，在此不敢妄作斷言，只待日後或有更多史料，再做討論。

在元祐末年開始出現的南方學子身上，可以看到宋代菁英由中央官僚到地方士人轉變的雛形。與二程原初學友多出身仕宦大族不同，他們幾乎是在這一代才具有太學生或進士身分，但家境殷實，家族在鄉里也居有領導地位。例如元豐「九先生」的後人葉適雖自稱永嘉乃「僻遠下州，見聞最晚」，但這可以說是對外的自謙，在永嘉本地境內，「九先生」不僅是最早將洛學傳入桑梓，開學術風氣之先者，家境更大多富裕，是當地有影響的望族，甚至屢有作為地方官員左右手者。²³⁵除了難以尋覓史料者之外，其他南方門人也大都屬於鄉里間的領導人物。只是「九先生」是以一個大型的親族、師友網絡的模式出現，也因此後世記載中特別突出。

筆者並非要否定相傳「九先生」為永嘉傳洛學之先的說法，「九先生」中的周行己、許景衡確實是永嘉從學程門的先行者，

²³¹ 宋·江公望，〈王聖俞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21冊，卷2621，頁349。

²³² 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頁2-21。

²³³ 宋·李侗，〈豫章羅先生墓誌銘〉，收入陳利華，《羅從彥故里行實錄》（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15），頁67-69。

²³⁴ 宋·羅從彥，《豫章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4，〈事實〉，頁1。

²³⁵ 楊萬里，〈溫州「太學九先生」的學術及其文學創作〉，頁75-83。

然而如謝佃、鮑若雨等從學的時間，可能並不晚於「九先生」。而以周行己、許景衡為首的永嘉士人團體，可能因同為親友；或與永嘉後進陳傅良、葉適等均有淵源，²³⁶相互為文作記，記載甚豐，因此聲名之盛，過於其他永嘉學子之上。

至於在此階段為何少見北方無淵源太學生加入程門群體？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二程北方關係網絡範圍極廣，來學弟子或多或少都能沾上一點邊（如和呂、韓家有淵源者李朴、李處權等）；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並非沒有北方弟子，只是史料不存。由於北方淪陷，在進入南宋以後，程學門人幾乎以南方為主，少見北人，以西北學者為主的關學學脈記載更是直接斷絕，²³⁷南方弟子可能因為回到家鄉，得以保存較多史料。

²³⁶ 沈躬行從曾孫沈體仁為陳傅良弟子，葉適亦為沈體仁、沈大經（沈躬行從子）、沈大廉（沈躬行從子）友人。參見：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頁83-84。

²³⁷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504。

五、元符三年起的無淵源平民學子

(一) 來自河南、洛陽地域的無淵源平民學子

表 3 無淵源平民學子

1、群體	北方無淵源平民學子（8人）
2、時間	元符三年（1100）起
3、地點	河南、洛陽本地為主
4、性質	平民家族、白衣士人
5、人物	
洛陽	張繹、馮理、孟厚、范楫
山東	馬伸、焦瑗
不詳	暢大隱、暢中伯
6、關鍵詞	北方出身、平民家族、白衣士人

資料來源：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程門最晚形成的群體，是自元符三年起出現，來自河南地域，與二程原初關係網絡並無淵源的平民學子（詳見「表3」）。特意點出「平民」，主要是有別於從前北方弟子的仕宦家族出身，²³⁸程頤的學術聲望，突破了原有的關係網絡，成為平民士人求學的一個選擇。另一方面，也代表這群弟子迥異於雖為平民，但有意仕進的程門前輩（太學生、考科舉）。選擇維持「平民」身分，不願入仕的意圖。這似乎也說明了洛學成為了在科舉之外的另一種理想。

此時新一波學子湧現的原因，可能是元符三年哲宗病逝，徽宗即位，意圖平息新舊黨爭，學禁暫時解除，程頤被從涪州放回

²³⁸ 由元符三年程頤被放歸，到大觀元年程頤過世，只有短短七年。且解禁不到三年，黨禁又起，這個時間留下記載的弟子只有八位，樣本數遠比元祐、紹聖為少，時間既短，政局又不穩，可能有其他來求學的南北學子均被程頤所拒，或者未曾留下記錄，並不表示此時一定沒有其他南方學子來學。

洛陽，給了本地士人得以從學的機會。可惜好景不常，崇寧元年，對元祐政治再次進行打壓，在王氏新學被尊為官學的情況下，²³⁹這批程門學子並沒有像前輩一樣積極出仕。隨著日後黨禍加劇，專注個人心性、嚴謹的修身之學成為了他們的主要標誌。

這群學子中，最為人熟知的應是在程頤口中「吾晚得二士」，與尹焞並稱的張繹。²⁴⁰張繹出身河南農家，早年為人幫傭，因羨慕為官威儀，立志讀書，雖曾動念科考，後又認為舉業不足觀，恰好遇到周行己為官河南，引介他拜見程頤，自此心服拜入程門。程頤對他也甚為看重，為他聘娶程氏女子，讓他與士大夫家族聯姻。²⁴¹有學者指出，在南宋，家族的婚姻選擇上，道學成為了中舉入仕的代替品，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價值標準。²⁴²程頤可說是此一風潮的先行者。比起世家子弟或新科進士，選擇了將族中女子許配給他認可的弟子。這應當也是唐宋之間，官宦家族擇婚由「重閥閱」到「貴人物」的一個轉向。²⁴³程頤臨終時，還親自將生平唯一自著《易傳》交付張繹。²⁴⁴以上種種，均可見無家世背景、亦無功名的張繹在程頤晚年的重要性。

馮理是河南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人，因為他自號「東臯處士」，應不具功名，由父、祖「故不仕」的記載，²⁴⁵也可知他並非出身士大夫之家。在尹焞筆下，馮理每每自與洛陽「相去甚遠」的汝州前來，每至「必同處講學，忘鑽仰之勞」。²⁴⁶同為平

²³⁹ 新學在北宋後期60年間在官方地位居於獨尊。李華瑞，〈南宋時期新學與理學的消長〉，《史林》，2002：3（上海，2002.8），頁28-34。

²⁴⁰ 元·脫脫等，《宋史》，卷428，〈張繹傳〉，頁12733。

²⁴¹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12，頁1080。

²⁴²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著，劉雲軍譯，《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頁230。

²⁴³ 姜宇、王善軍，〈從「尚閥閱」到「貴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價值取向的比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西安，2022.3），頁119-126。

²⁴⁴ 陳石軍，〈程頤《易傳》成書流傳新論〉，《周易研究》，2021：4（濟南，2021.8），頁60-61。

²⁴⁵ 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第3冊，頁820。

²⁴⁶ 宋·尹焞，〈跋馮聖先墓誌〉，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

民學子的還有山東人焦瑗，他「嘗遊伊川之門」，後因戰亂避居至鄞（今浙江省寧波市），仍致力傳授師門學術，「鄉之洛學遂日盛」。趙鼎（1085-1147）為相時起用尹焞、朱震（?-1138）等洛學傳人，也有意推薦焦瑗為官，卻為其所拒。

馬伸（?-1129）是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人，弱冠登第的他是紹聖四年進士，是這群程門弟子中少數有功名者，但據其行狀，馬伸「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跡，州縣人無知者」，應是對晉升沒有太大企圖，史料中也看不到其先代有出仕記載。馬伸真正登門求學，是要到崇寧二年，當時正值黨禁，門人四散，程頤遍告求學者：「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馬伸特地由正任職的吏部「求為西京（洛陽）司法曹」以求親近。又透過張繹，多次請謁，方才得見，自此出入門下三年，風雨無阻。²⁴⁷

這批弟子多數生平不詳，相關學術記載更少，如暢大隱、暢中伯兩人，除了知道暢大隱為洛陽本地人外，暢中伯更是僅知姓、字而不知名。²⁴⁸在下面的文章中，筆者將試圖由零星史料中，呈現他們以個人修身、出處進退所呈現的風貌。

（二）以個人心性、修身、出處進退為主的學術表現

這群程門弟子關注的重心，多以個人心性修養、出處進退為主。以這段時期最突出的門人張繹來說，其為學重心就是偏向於個人修持。馬伸則以在學禁期間立志求學、力主抗金等事蹟流傳。其他則多以隱遁不仕，嚴謹修身的樣貌出現。²⁴⁹政局的嚴酷，也可能是此一時期，程門弟子難以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緣故。

卷3053，頁46-47。

²⁴⁷ 宋·何兌，〈馬伸逸士狀〉，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79冊，卷3923，頁170。

²⁴⁸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14，頁1110、1111。

²⁴⁹ 他們也不像仕宦家族出身弟子，對家法，家族有眾多討論。由後世流傳的《童蒙訓》、《少儀外傳（辨志錄）》及《呂氏家範》等書籍可知，呂氏家族內部，其實有眾多教養子孫孝友和睦的家訓。參見：姚紅，《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及其文獻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在張繹所記的程門語錄，以及為他人提及的文字中，論時事有十九則、為學次第一則、心性修養十二則，為政道理兩則、禮（二程與張載討論）一則、《易》一則、關佛一則。²⁵⁰可說他最關心的內容，是個人的心性修養。

焦瑗在行狀中展示的風格是「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即使在他身故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為先生弟子也」。²⁵¹一生學行的記述中，個人修養就佔了絕大部分。

馬伸的學行主要表現在他求學之誠，以及日後的剛強抗金。靖康之難，汴京淪陷，金人立張邦昌（1081-1127），脅持百官擁戴，唯獨時為御史的馬伸挺身斥責，與同屬程門的吳給力主迎回康王、復嗣君位。又與吳給計畫與金人談判，乞存趙氏。同時有武將吳革暗中籌劃起兵，奪回徽欽二宗，與他同謀的馬伸、吳給和呂好問均是程門弟子，可惜最後功虧一簣。²⁵²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即位，馬伸不遠千里奔赴行在，論事仍直言不諱，直指高宗信用的執政諸端不法，因而被謫降金兵地界，遇害身亡。²⁵³

馬伸的剛強性格，在程頤晚年弟子中是記載最多、也最為突出的一位。程頤素以剛強著稱，如在元祐以後，朝廷幾次敦請他出仕，皆被嚴詞推拒，甚至在元祐八年表示：「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²⁵⁴此後黨禍日甚，更是一心講學，遠離政局。馬伸在出仕與否的嚴厲態度上，可說與程頤一脈相承。

馮理也是以堅定求學著稱。除了由汝州遠道而來聽講的事

²⁵⁰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遺書卷第21上，頁267-274（門人張繹錄），及《二程集》中提及張繹記載。

²⁵¹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30，〈劉李諸儒學案〉，頁1076-1077。

²⁵²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條，頁59。

²⁵³ 元·脫脫等，《宋史》，卷455，〈馬伸傳〉，頁13367。

²⁵⁴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文集卷第19，頁255。

蹟，尹焞特別記載，靖康亂後，他與馮理相見，唏噓之餘，得馮理出示當年程門筆記，歷經戰火、南渡都未曾丟失，深感「可見其志之所存也」。馮理和程門的關係一直維持到了下一代，馮理之子馮忠恕也投入尹焞門下，²⁵⁵著有《涪陵記善錄》，是記載尹焞言行最為詳盡的著作。

與尹焞、張繹同歲，同在此時從學的還有孟厚和范域（一作域）。²⁵⁶孟厚是洛陽本地人，「舉業特精」，但卻並沒有他考取功名的記載，看來應是白身。范域也是洛陽人，只有歷任員外郎，提舉京西南路等記載。²⁵⁷他們最著名的事蹟，是在程頤過世時，不畏黨禍，是少數前往送葬的門人，²⁵⁸顯示了他們在巨大壓力下的堅強性格。至於其他記載，恐怕都盡數湮沒在隨後的戰火之中。

六、結論

總結以上，首先可以發現元祐以後，程門弟子主要由三大群體組成，形成又有先後之分。程顥雖在元豐八年過世，學術同道相繼凋零，但這些人的後輩仍聚集在程頤身旁，二程以韓、呂家族為核心組成的學術關係網絡依然延伸到了下一代，成為程門的中堅力量。元祐以後，來自東南的太學生開始成為程門的一大群體。最後則是元符三年起出現，與程家原無淵源、慕名而來的白衣學子。

其次，如由本文提出的三階段來看，可以看出洛學的發展與當時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洛學一開始是在家族、親友網絡之間流傳，他們多出身歷代為官的仕宦大族，以朝廷俸祿為後盾。

²⁵⁵ 宋·尹焞，〈跋馮聖先墓誌〉，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053，頁46-47。

²⁵⁶ 孟厚拜師時，程頤曾說：「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可知孟厚從學在張繹之後，且時間有所重疊。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外書卷第12，頁436。

²⁵⁷ 宋·范域，〈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代住持恩禪師塔銘並序〉，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142冊，卷3058，頁132。

²⁵⁸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4，頁974。

在元祐以前，雖有個別無淵源學子（如楊時）前來拜師，但人數不多。元祐以後，程頤先為帝師，又執掌國子監，聲名日盛，加上神宗朝改革太學，令更多外地學子得以在京師求學，他們以經濟為家族根基，多是這一代才具有太學生或進士身分，是在世卿、世祿消失後，宋元時期的士人家族典型，這些人也成為程門新一波弟子代表。在元符三年以後，最主要的影響是政治因素，黨禁的打擊使得程門零落，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出現的多是與程頤原初網絡無淵源的平民學子，強調「平民」一方面是有別於過去程門弟子多為官宦或太學生，另一方面則是注意到這群弟子無意為官的心態，這似乎也說明了洛學成為了在科舉之外的另一種理想。在政治環境不利的狀況下，洛學可以作為一種不為做官的學術存在，並有人持續傳播。同時，他們為學偏重於心性與個人修養，對於出處、持身的態度更是嚴厲。

在政局動盪中，這群弟子大都展現了寧願捨棄官位、受黨禍牽連也要堅守師門的記載，這固然表現出程門弟子的心志堅定，也顯示了洛學不僅是流傳在士大夫階層之間，也為平民出身、無意干祿的士人所擁抱、接受。洛學能吸引一批人在選擇在黨爭、學禁下堅持跟從，一直到南宋成為顯學。在堅守師門的弟子中，固然有許多原就出自二程的家族和關係網絡，也有不少是因為對學術的追求而堅守師門，這可說也相當程度呼應了當初二程退居洛陽，「以倡明道學為己任」的初衷。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韋彥廷）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整理，《涑水記聞》，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第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 宋·朱弁撰，張劍光整理，《曲洧舊聞》，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朱彧撰，李偉國整理，《萍州可談》，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呂本中撰，韓西山輯校，《呂本中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
- 宋·呂本中，查清華、胡儉整理，《師友雜誌》，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景印摘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第26冊，臺北：世界書局，2015。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宋·李心傳，《道命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邵博撰，夏廣興整理，《邵氏聞見後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周行己，《浮沚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宋·范成大撰，陸振嶽校點，《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宋·胡寅撰，容肇祖點校，《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宋·祝穆撰，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陳長方撰，許沛藻整理，《步里客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許景衡撰，陳光熙點校，《許景衡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 宋·黃士毅編，《和靖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6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 宋·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
-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 宋·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
- 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宋·劉安節撰，陳光熙點校，《劉安節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韓滉，《澗泉日記》，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第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
- 宋·羅從彥，《豫章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元·脫脫等，《宋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明·王瓚、蔡芳編纂，胡珠生校注，《〔弘治〕溫州府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明·黃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舊志整理組、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整理，《八閩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明·薛應旂，《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王昶，《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
- 清·池生春、諸星杓編，《伊川先生年譜》，收入周和平等輯，《北圖年譜叢刊》，第19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池生春、諸星杓，《明道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4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于琨修，清·陳玉璣纂，《〔康熙〕常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36冊，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孫衣言撰，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上）》，收入《溫州文獻叢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 清·孫鏘鳴，《浮沚先生年譜》，收入周德明、吳建偉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清·畢沅，《新校續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2012。
- 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游智開，《游定夫先生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 清·厲鶚，《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何新所編，《新出宋代墓誌碑刻輯錄（北宋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
-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6。

二、近人專書

王巧生，《二程弟子心性論研究》，武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王宇，《永嘉學派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Peter K. Bol）著，王昌偉譯，《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文碧方，《關洛之間——以呂大臨思想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1。

申緒璐，《人能弘道：二程語錄與洛學門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李敬峰，《二程門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0。

邸利平，《道由中出——呂大臨的道學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姚紅，《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及其文獻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姚瀛挺主編，《宋代文化史》，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

柏文莉著，劉雲軍譯，《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高令印，《游酢評傳》，香港：中國翰林出版社，2002。

-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
- 陳利華，《羅從彥故里行實錄》，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15。
- 陳海紅，《呂大臨評傳》，陝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 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 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劉京菊，《承洛啟閩——道南學派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Chu, Ming-kin (朱銘堅).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三、近人論文

- 王永顏，〈宋代中央官學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行考核活動〉，《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徐州，2017.5，頁102-108。
- 王曾瑜，〈河南程氏家族研究〉，收入王曾瑜，《錙銖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頁277-281。
- 王曾瑜，〈洛蜀朔黨爭辯〉，收入王曾瑜，《絲毫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頁114-134。
- 王鳳賢，〈北宋——浙東學術的「草昧時期」〉，《浙江學刊》，1990：5，杭州，1990.10，頁52-62。
- 朱海濱，〈宋代溫州科舉的興盛及其背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5：5，杭州，2015.10，頁50-57。
- 朱銘堅，〈黨爭漩渦中的太學——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新史學》，29：2，臺北，2018.6，頁63-118。
- 尚紅兵，〈居洛士宦與北宋神哲朝政〉，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

- 碩士論文，2011。
- 吳修安，〈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家族與社會〉，《新史學》，29：4，臺北，2018.12，頁1-70。
- 李華瑞，〈南宋時期新學與理學的消長〉，《史林》，2002：3，上海，2002.8，頁28-34。
- 李敬峰，〈二程門人總體性特徵概述〉，《社科縱橫》，2012：10，蘭州，2012.10，頁103-105。
- 李敬峰，〈二程洛學的羽翼、突破與轉向——以楊時為中心而展開〉，《學術交流》，2018：3，哈爾濱，2018.3，頁29-34。
- 何新所、賈倩，〈北宋理學家朱光庭祖父朱文郁墓誌考釋〉，《語文知識》，2013：4，鄭州，2013.12，頁8-11。
- 林煌達，〈唐宋州縣衙吏員之探討〉，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外交、軍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頁125-148。
- 周夢江，〈試論永嘉「元豐」九先生〉，《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5，杭州，1991.10，頁20-27。
- 紀晏如，〈二程治道論的內涵及其思想史背景〉，《中正歷史學刊》，19，嘉義，2016.12，頁53-90。
- 紀晏如，〈理學興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二程、邵雍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3。
- 姜宇、王善軍，〈從「尚閥閱」到「貴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價值取向的比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西安，2022.3，頁119-126。
- 孫逸超，〈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焞〉，《中華文史論叢》，2023：2，上海，2023，頁257-289。
- 郝若貝著，易素梅、林小異譯，〈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轉型〉，收入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75-246。
- 陳石軍，〈程頤《易傳》成書流傳新論〉，《周易研究》，2021：4，濟南，2021.8，頁56-63。

- 陳安金，〈論北宋中後期制度轉型與溫州士子的機遇〉，《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溫州，2007.11，頁32-37。
- 陳利華，〈羅從彥受學楊時考〉，《武夷學院學報》，2021：1，武夷山，2021.1，頁1-6。
- 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21。
- 張祥雲，〈北宋西京國子監考探〉，《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12：6，周口，2012.11，頁74-77。
- 張惠芬，〈論宋代的精舍與書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7：1，上海，1987.3，頁31-44。
- 張應橋，〈北宋劉幾墓誌考釋〉，《四川文物》，2011：3，成都，2011.6，頁67-73。
- 陸敏珍，〈「違志開道」：洛學與永嘉元豐九先生〉，《中山大學學報》，2009：6，廣州，2009.11，頁108-114。
- 陸敏珍，〈北宋時期的洛陽與洛學〉，《浙江學刊》，2011：2，杭州，2011.3，頁117-124。
- 陸敏珍，〈洛學傳人與洛學學派的建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廣州，2011.7，頁138-144。
- 黃純艷，〈北宋財政能力與國家治理〉，《史學集刊》，2021：5，長春，2021.9，頁14-19。
- 楊萬里，〈林石與溫州「太學九先生」之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北京，2010.3，頁149-155。
- 楊萬里，〈溫州「太學九先生」的學術及其文學創作〉，《文學遺產》，2010：6，北京，2010.11，頁75-83。
- 漆俠，〈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收入漆俠，《知困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頁198-211。
- 趙國權，〈洛學的發源地——伊川書院考略〉，《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10：4，南昌，2010.8，頁107-110。
- 蔡方鹿、姜雪，〈尹焞的理學思想及其對程頤思想的傳播〉，《中原文化

- 研究》，2021：1，鄭州，2021.7，頁54-60。
- 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態與科舉的地理闡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4，西安，2015.10，頁71-83。
- 霍無忌，〈趙挺之與宋徽宗朝前期的政局演變〉，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二十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頁73-92。
- 鍾彩鈞，〈二程聖人之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 蘇育成，〈從再起到挫折——兩宋之交舊黨復權的政治史考察（1104-114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 蘭軍，〈學緣與血緣——北宋永嘉學術傳衍路徑探究〉，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二十六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408-419。

A Study on the Academic Network of Cheng Yi's Last Years: Elites, Emerging Scholar-officials, and Civilian Disciples

Ji, Yan-ru*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es and colleagues of Cheng Yi (1033-1107) and his brother Cheng Hao (1032-1085).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years between the start of the Yuanyou period (1086) and the start of the Daguan period (1107), when Cheng Yi passed away. Prior to the Yuanyou period, the disciples of the two Chengs were predominantly northern-born offspring of intermarried officials and aristocrats. Even after the onset of the Yuanyou period, this group continued to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heng Yi's followers. However, from the later Yuanyou years to the Shaosheng period (1094-1098), there was a marked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the Imperial Academy, as well as of scholars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s. This new wave of Cheng followers, many of whom were Imperial Academy students or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enefited from extensive family networks and substantial economic support, which enabled their scholarly pursuits.

After the year 1100, commoners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s began to appear among Cheng Yi's disciples. This group, lacking familial or social ties to the Cheng Brothers, tended to focus on the study of mind-nature and personal self-cultivation. Amidst political upheavals, members of all three groups demonstrated a willingness to relinquish official positions and endure political persecution in order to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allegiance to their mentors. This not only attests to the unwavering determination of the

*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teachings of the Luoyang school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scholarly elite; they were embraced as well by commoners who had no intention of entering government service.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Cheng Yi's disciples has tended to focus on prominent figures such as Yang Shi (1053-1135), Hu Anguo (1074-1138), and others, often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ir academic thought. Occasionally, such studies approach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lens of factional conflict between the *xindang* (reform faction) and the *jiudang* (anti-reform faction), discussing the experiences of Luoyang school disciples. By analyzing the chronology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Luoyang school discipl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erspective not emphasized in previous research.

Keywords: Cheng Brothers, Cheng Yi, New-Confucianism, Social networks, Luoyang, Confucianism, Song Dynasty, a government official (*shidafu* 士大夫), Epitaphs

